

反导： 美俄危险的军火游戏



●梁 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
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五角大楼在反导上年均 100 亿美元巨资总算没有白花。尽管美国参院刚刚通过的 2008 年军事预算削减了布什的反导资金，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的预算被砍了一半，但毕竟并不影响反导成为小布什两届总统任期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

从 2002 年退出冷战时期签署的反导条约，到如今正式开始与波兰和捷克谈判部署反导系统，布什在反导上的成就大大刺激了俄国人。莫斯科军方已有呼声，认为美国既开了先例，俄国也能退出 1987 年由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署的《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该条约是历史上第一个销毁核武器的国际性条约，是标志着冷战走向结束的里程碑文件之一。但由于前苏联解体后，俄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大不如前，因此俄国军方一直对限制俄军装备 500—5000 公里中短程导弹的“中导条约”耿耿于怀。伊万诺夫在一次和外国记者谈话时就把话说了开，美国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居，他们永远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在俄国周边，仅核国家就有多个，还面临着聚集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国际恐怖势力的威胁。因此，俄必须拥有全方位的打击能力。事实上，在美国提出欧洲反导方案后，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索洛夫佐夫上将就已经挑明，作为回应，俄罗斯可能将退出“中导条约”，以便获得拥有、生产并部署射程为 500—5000 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的权利。这一类型的导弹除了可以用来实施战术核攻击外，也将对旨在拦截 5000 公里以上射程战略导弹的反导系统予以致命打击。

俄国人如此反应与冷战时期毫无二致。如果欧洲反导最后真的按照美俄两国的逻辑演变下去，毫无疑问，将会带动一场新的全球战略领域的军备竞赛。

前苏联曾经拥有世上最庞大的国防军工体系。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大约 70% 的科研与生产能力，但叶利钦时代俄军军费捉襟见肘，军工产业惨淡经营。普京上台后，随着新的军事学说和国防计划的颁布，俄罗斯军工重新焕发出生机。俄国军事预算从 1999 年的 47 亿美元猛增到 2006 年的 240 亿，其中仅用于新装备和新技术订购的资金就达到了 50 亿。今年俄国防预算 307 亿美元，其中用于更新军备的经费为 110 亿美元。据俄罗斯媒体透露，俄国防部已确定在今年为战略火箭军订购 17 套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去年只订购了四套），以及数量不少的“针式”战术导弹。

现在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一副总理伊万诺夫出身军方，正是他在出任国防部长期间，大力倡导俄国军队、尤其是战略火箭军的现代化升级，提出要在 10 至 15 年之内使俄军装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美国新的欧洲反导计划正好推动伊万诺夫的强军方案，为他在今年明年争取到更多国防开支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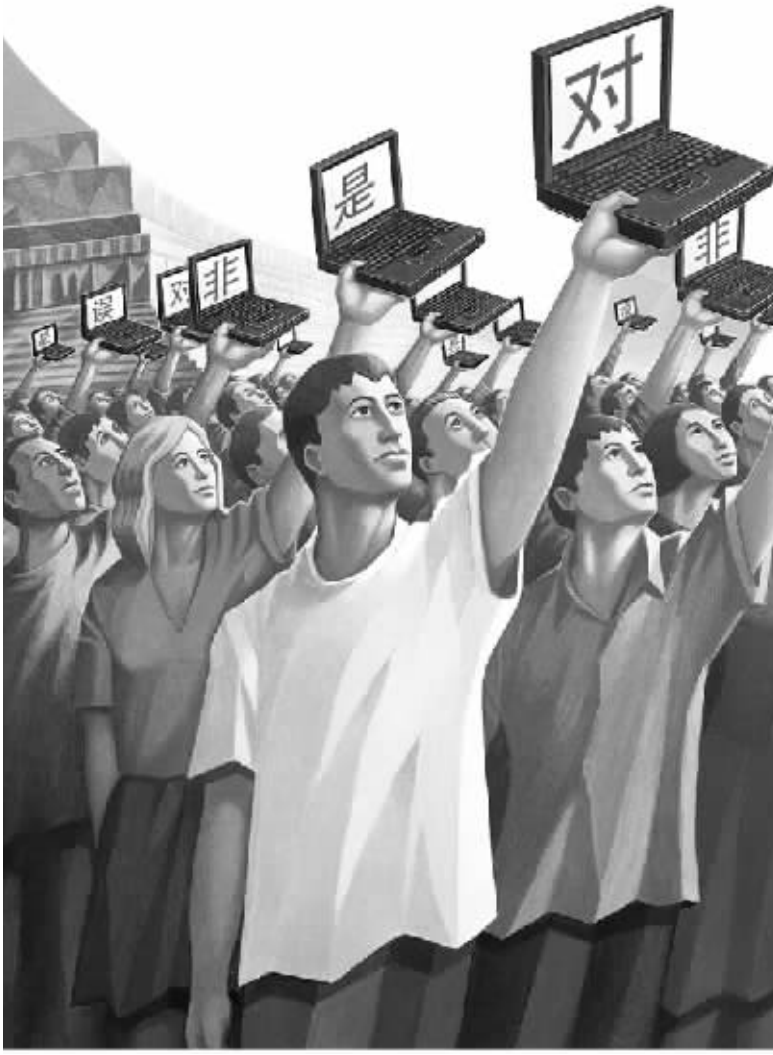
除了获得本国的巨大订单外，俄军军火出口额近年也在大幅增长。据俄方面的统计，2001 年，俄军火出口额 37 亿美元，2003 年达到 56 亿美元，2005 年增至 61 亿美元。而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2005 年，俄罗斯出口至亚洲、中东和拉美地区的武器总值已达 70 亿美元，而美国在这些市场只做出了 62 亿美元生意。这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首次在军火出口上输给俄罗斯。

去年购买俄军火的国家已增加到 64 个。俄罗斯总统国防工业顾问布卢京早些时候接受俄媒体采访时预计，俄今年军火出口额可达 75 亿美元。他还表示，加上俄军的订购，俄国防工业获得的军火采购订单已达 300 亿美元，足以保障军工企业未来几年的稳定发展。

但无论是俄美，其军火出口主要都集中在第三世界，俄国这些年 90% 的军火卖给了亚洲和拉美国家，美国也有 70% 的军火流向亚洲。因此，美国现在决定在东西欧部署反导系统，很可能导致俄美的军火出口竞争转向欧洲。

东欧国家一直使用苏制武器，这些国家武器的更新换代是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在军火出口上始终在与美国争夺的俄罗斯自然不会将此拱手出让。但冷战结束后欧洲化敌为友，再加上有北约的保障，欧洲大陆不太可能再爆发大规模战争，因此欧洲各国普遍减少了国防开支，东欧各国也因此而寻求美国和西欧作为新的军火供货商。欧洲反导方案将给俄国提供一个新的反击机会，一方面，俄美的战略敌对必然会影响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安全，从而使得各国普遍意识到要重新加强国防；另一方面，在反导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已使欧洲内部出现了分裂，从而有可能导致他们确立各不相同的国防政策。

另外，美国越是强调欧洲反导是为了应对伊朗等“邪恶轴心”国家的威胁，后者对美国的敌意就会越强，也就越需要唯一能够与美国武器抗衡的俄国军火。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军事技术合作最终往往会促成双方战略盟友关系的形成，比如冷战时期前苏联和古巴，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与委内瑞拉。所以，如今俄美在欧洲反导问题上的对抗，是否像当年苏美在核领域的战略合作那样，最终引发古巴导弹危机，这不仅是俄美两国首脑，也是整个国际社会不能不密切关注的。



陈茜制图

意图全面跟着政策走。经过了 2001 年至 2005 年长达五年的实践，付出了指数下跌 60% 大量市值蒸发的代价，管理层才摸索出“股权分置”改革的系列政策，推出了政府、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都能够“赢”的改革方案，照顾了各方利益，调动了各方积极性，才实现了制度成功变革，获得了市场兴旺的大好局面。如今投资者全面入市，不是盲目的行为，他们是顺应了政策的召唤，即发展股市，引导资金向技术进步、管理先进、业绩优良的企业集中，从而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培育出可以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企业集团和企业集群；发展股市，引导过剩的资金向股市转移，从而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直接融资的难题，为定向增发、整体上市、资产流入等体制性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发展股市，引导资金进入股市，从而促使新上市企业的融资从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化解金融风险，从而实现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通过股市这一平台利用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资本的可能。因此，股市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效的平台，政府对

其只有呵护，但不会溺爱，也不会着力打击。中国投资者在这方面是很理性的，他们认准了政策的意图，因此以逐利的形式全面介入。

第五，当前股市走牛的制度改革基础及业绩增长基础还很稳固。去年以来上市公司业绩逐季增长，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外汇制度的改革，导致了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形成，在新的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的计算方法使许多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银行、保险、证券、航空、地产企业的投资价值不断提升，在股指上升的同时市盈率却下降。这样的结果使在上证指数 3000 点左右就唱空的海外投资银行家们失语。同时，中国老百姓开始怀疑，外资是否会像唱衰房地产业那样，一边唱空一边买进股票？最近大力唱空宣称要撤离沪深股市的 QFII 似乎就撤离得并不积极。

那么，投资者“误会”政策意图会有什么后果呢？目前能估计的大致可列出四条：调控政策会更加频繁，调控股市的政策力度会更加加大，短期行情上升幅度减少震荡频率增加，行情变短期快速上升的格局而为慢牛形态。



●王育理
管理专家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来自全国的索捐者络绎不绝，他不仅被各地的求助者骂为骗子，而且受到黑社会的勒索、恐吓，以至于 5 家企业因此而倒闭。慈善家成了典型的弱势群体。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还不习惯与高尚的精神为伍。

慈善本来是一种心境，是内生的精神需求。当一个人在自己并不富足的情况下，却知道奉献自己而慷慨施与时，受到的却是媒体文字的嘲弄和庸众失去理智的索捐！今天的社会太过浮躁，社会心理太过功利、太过现实，邵建波与赵雪定阳光使命遭遇的尴尬，表征出这个时代的尴尬！

遭遇尴尬的还有发布中国慈善榜的国际媒体。《福布斯》两周前正式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中国慈善榜。这是《福布斯》为中国富豪排名 8 年来，取消的第一张榜单。据《福布斯》中文版的官方说法，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成熟，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不愿公开其在慈善领域的贡献，增加了数据调查难度。

中国慈善榜真正的尴尬在于：真正捐出巨款的却常常处事低调，不求闻达；把生命献给慈善事业的人因为善款少，而又无法称量；慈善榜上的慈善家往往会成为一股困顿无助的人索捐的对象，有的还成为政府官员关联学校团体的私人钱袋；每年拿出一笔善款却不知道不清来源的人，又以慈善的名义赚取更大的利益。许多捐款往住要的是慈善家这块招牌。这块招牌有时会形成比广告还要强势的品牌知名度，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慈善的根基在人心和精神。美国 1999 年慈善机构获得的捐款总额为 1900 亿美元，其中 85% 的捐款来自普通民众，10% 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

●李国旺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年后逐步收紧的控制房价政策，促使房地产投资性需求从 2005 年起逐步向股市转移，而牛气冲天的股市成了理财等需求引发的资金流的最好的吸收平台。毋庸置疑，确实存在诸如贷款炒股、违规炒股等值得警惕的现象，政府应当重点打击，但这是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所谓“全民炒股”经济背景的合理需求，更何况现在说“全民炒股”太言过其实，再怎么算，股民人数总和也不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将储蓄移至股市力求有更好回报，其行为结果是减轻间接融资的压力、化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并为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做出了贡献。连国资委官员王忠明都认为“全民炒股”是天大的好事，因为结果将是国有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第三，理财观念与暴富心理的作用下的投资者结构散户化，形成向上无视政策只顾低头炒股的现象。中国没有信托传统文化，老百姓喜欢直接理财，在农业社会是直接耕种，自给自足；进入工业化后，以单位为单元，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搞起来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国工业化历史不长，金融业还不发达，专业分工，委托理财等观念还没有深入到民族血液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观念则深入人心。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在房地产火爆的时候，房地产相关的信托产品卖得火爆，因为赚钱效应是眼见为实的；2006 年至 2007 年初基金业绩比散户做得好，也曾经出现了开放式基金供不应求的局面，但一旦公募基金的收益没有超过大盘，基民干脆赎回基金又转回做股民。在无信托文化背景又追求一日暴富双重作用下，中国投资者结构的散户化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开放式基金无法主动长期投资布局的原因。

第四，投资者坚信股市长期走牛才能实现政府利益、企业利益和投资者利益最大化。说起来，国内投资者是最不听话又最听话，说不听话是在暴富心态下在一定时期无视政策调整，说听话是他们会根据政策

■排沙简金

中国慈善精神被绑架了

一位满腔热忱致力慈善事业的人，母亲却被逼得吐血，这样的报道，又一次把国人置于生存与毁灭的矛盾漩涡之中。

南京个体户邵建波，23 年来累计捐款 300 余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并利用自己的生意资源帮助 2000 多名下岗职工创业致富，被南京市政府评为“爱心大使”。邵建波的故事见诸媒体后，岂料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已有 300 多人找上门来向他索要捐款，索取金额从 5000 元到 100 万不等，让这位“凡人慈善家”不得不怀着“索捐”之痛四处“躲债”。5 月 7 日上午，10 多名索捐者找到邵建波索捐不成，一齐跑到独居的祖母黄老太家中去索捐，吵闹，并屡次发生口角冲突，黄老太在焦虑之下食管胃底大出血。邵建波可以救助众多不相识的弱者，却无力保护自己的母亲。在冷冷清清的医院，看着病床上不能说话的母亲，辛酸的眼泪奔涌而出：“我捐助过那么多人，现在又有谁肯来医院看看她呢？！”

与邵建波同期被曝光的另外一个捐款 100 万元资助学校的赵雪定，两天之内就遭遇 176 人上门“索捐”。而赵雪定承包的一个电影院因为没钱雇人干活，不得不自己打扫厕所。一家子挤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过着清淡的生活。再清楚不过，邵建波与赵雪定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得到国人的理解。那些蜂拥而至的索捐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媒体的蛊惑。媒体在报道邵建波、赵雪定居于平淡而慷慨捐助的善举时，不惜使用“慈善狂人”与“捐款疯子”这样的字眼，这岂非在绑架慈善家？

青岛的慈善家王明殿，本来有 5 家企业，默默行善 15 年，累计金额超过百万。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就再也

■眼观四处

调控政策何以会被误读

——“新行为金融”考察之二

当中国资本市场行情今年首度在上年涨幅的基础上续升 50% 时，国内经济理论界、国际投资银行界及政府官员开始担忧，生怕明天股市的泡沫就会破裂，因此大力呼吁政府出台政策，调控股市。直接与股市有关的中央部委都力求从增加股市供应和抑制投资者需求上下功夫，试着通过“市场化的调控”，不让能走 10 年的牛市在两年内走完，以避免股市剧烈震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是在煞费苦心呵护而非打压股市。可为什么投资者“误会”政策意图反其道而行之，使理论上推断本来应当有较大幅度回调的股市逆向上升呢？

笔者试着从中国投资者的行为特点和政策认知角度对此作些分析。

首先，是股市的财富效应对投资者蜂拥入市的催化作用。2005 年底

或者迟至 2006 年底入市的投资者，多数都有出乎意料的投资收益。接连不断的成功案例，群体非理性反而能发财的火热气氛，形成了“噪音”决定行情，散户取得定价权的“非常”现象。这使得以“价值投资模型”为投资导向的理性投资者异常“愤怒”，疯狂股市在一定时期全面修正了深入他们血液的投资理论，逼得他们集体高喊股市泡沫论。对此，有些知名经济评论家则无奈感叹，当前噪音冲击下的沪深股市已没有金融学工具可以分析了。

其次，居民的财富累积有急切的理财需求。据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 1 月 25 日公布的数据，2006 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 16.1581 万亿元。2000 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热，引发了居民直接购房需求，从而将本币升值引发的住房价格上涨的压力提前 5 年释放。但 2003

■长短集

谁给了银行 付费免排队之权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银行仅仅发挥着支配和调节资金流动方向的功能，本质上就是一个中介服者。银行的产品在所有权上并非完全是银行自有的私人品，岂能由银行自我经营？一个备受争议的所谓“妙招”，透露的是某些国有经营机构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政策保护的影响下所养成的“懒惰病”，他们不懂得如何在新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还一味地套用曾经的那些不适宜的做法。

或许是股市异常火爆的缘故吧，近日银行个人信贷业务数量剧增，以至于办理一次业务至少要排队等候达数小时之久。一些银行于是想出了付费免排队的“妙招”。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这一招似乎是需求大于供给条件下的必然结果，理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仔细思考后，却并非如此。

从经济学基本原理上看，私人商品具有价格上的排他性和生产上的竞争性。此时，私人商品价格将因供求质量变化而变化，是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的。但排队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似乎经典理论未曾论述过。这里，我们就需要从银行的功能和作用来分析了。一方面，银行是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投资场所，银行的产品就是居民暂时让渡流动性的现金，因此，居民是银行经营产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银行将自身持有的资金贷出以获得利差，获得资金的贷款方是银行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此时，银行仅仅发挥着支配和调节资金流动方向的功能，本质上就是一个中介服者，这与餐馆经营者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由此来看，银行的产品在所有权上并非完全是银行自有的私人品。既然不是私人品，那么因供求失衡所产生的排队，岂能由银行自我经营？

或许有人会说，在排队等候的人中，一些人或许有其他急事要办，他们通过自愿付费得到优先权属于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不算违背市场规律。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正如前面的分析结论，如果银行经营的产品具有公共品属性的话，那么银行解决排队难题的能力就涉及了消费者享有的公共资源数量。如果某些人通过高额付费而获得优先权，实质就等同于愿意出钱的人可以挤占他人使用的公共资源的数量。当然，这一交易也并非就一定不能达成，但前提是付费免排队者与未付费持久等候

者之间应该建立起利用转移机制，即把付费者付出的费用部分返回给那些持久等候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实际交易双方的利益对称，但银行绝不是交易中的一方，它甚至应该为不能有效解决排队难题而自责。比如，酒店禁止吸烟，但酒店经营者对抽烟者却不具罚款权力，因为酒店经营者不能把公共空间转化为自身可以经营和获取收益的产品。

既然付费免排队的理论逻辑不成立，那么，它在实践中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笔者认为，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银行解决排队难题能力的提高，维持甚至助长经营低效率的局面。这一点在国外银行大举进入的前提下，进一步凸显中国银行竞争力不高的现实。二是扭曲市场机制，甚至产生诱发市场的非稳定性。比如，为了获得免排队的货币收益，会不会滋生出一批专门从事“排队业务”的经营者呢？假如真的出现这样的群体，那么，谁来管制呢？银行？显然行不通，因为它是造成扭曲的始作俑者，其经营“排队业务”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偏激的人就会武断地认为这种“排队业务”就是银行自己制造出来的。

进一步分析，政府也无法管制。且不论政府实施管制的成本会有多高，仅就此种管制合法性就难以找到任何依据。

由上述分析可知，付费免排队是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但即便如此，它却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了，甚至还有人为其大唱赞歌。这不由得引发我们更多的深思：为什么这些明显不合理的做法却能够制度化？

一个备受争议的所谓“妙招”，透露的是某些国有经营机构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政策保护的影响下所养成的“懒惰病”，他们不懂得如何在新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还一味地套用曾经的那些不适宜的做法。其实，银行排队等候也并非最近才有的事情，笔者几年前在银行办理个人业务时，等候的时间平均也在 1.5 个小时以上。当时，我就痛感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只是近来随着个人信贷业务量增加而一些银行却并没有相应增加人员配备和服务窗口，排队等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不能不说，某些国有银行非常缺乏对自己身份的反省，依然主观地把自己定位在“舍我无他”的垄断性地位。时间不多了，在服务功能缺失的前提下，他们将拿什么与国外同行竞争者一争高下呢？